

杨启先
文集

第二卷



杨启先文集

第一卷

经济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吴 南

责任校对：杨晓莹

版式设计：周国强 周 昊

技术编辑：董永亭

杨启先文集（共三卷）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036

总编室电话：88191217 发行部电话：88191540

网址：www.esp.com.cn

电子邮件：esp@esp.com.cn

北京天宇星印刷厂印刷

永明装订厂装订

880×1230 32 开 46 印张 1000000 字

2001 年 9 月第一版 2001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7-5058-2636-0/F·2028 定价：95.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自序

杨启先，1927年6月生于重庆，大学毕业，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研究员，教授。

一、主要经历

自1946年起，即开始从事经济工作和教学、研究工作，至今已有50多年。期间的主要经历为：

1946年秋，在重庆敬业高级商业职业学校毕业后，进入重庆商业银行当职员。

1947年秋，考入川北大学（解放后改为四川师范大学）工商管理系，半工半读，到1951年毕业。

1951年秋，在四川师范大学工商管理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东北工业部人事处工作。

1952年11月，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被首批调入国家计委，先后在综合计划局和长期计划局工作，一直到1973年2月。在此期间，除1970年至1972年在计委“五七”干校劳动外，曾参加过历次全国国民经济长期规划、五年计划与年度计划的编制

和综合平衡工作，参与过多次全国计划文件和报告的起草。通过20年计划工作的实践，对全国宏观经济情况比较熟悉；对建国以来我国实行计划经济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历史与曲折过程，有较深较深的体会。

1973年3月，到河北大学任经济系副主任和计划统计教研室主任，负责讲授“国民经济计划”和“宏观经济管理”等课程，并着手研究如何搞好国民经济计划管理和提高社会经济效益等课题，一直到1981年上半年。

1981年7月，国务院成立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被首批调入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工作。1982年体制改革办公室改为体制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体改委），转入国家体改委工作，先后担任总体规划组组长（局长）和负责总体规划的专职委员（其中，1986年春到1988年春，曾兼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一直到1991年4月。在此期间，曾组织和参加了历次经济体制改革中长期规划和年度方案的制定，负责过体改委不少重要文件的起草；并且参加过中共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和从1983年到1987年共五次全国人代会上《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成就、经验、教训，以及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点与难点等问题，有比较系统的了解和认识。

1991年5月到现在，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工作，先后担任该研究会常务干事、副会长和副会长兼秘书长。1992年被国务院授予有突出贡献的经济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被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在此期间，曾参加过党的十四大文件和1993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并先后受聘为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河北大学、北京经济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国家行

政学院、铁道干部管理学院、中国企业管理培训中心、中国工业经济研究中心等单位的兼职教授。

二、主要经济观点

在过去 50 多年工作中，我大多数时间不是搞专业的经济研究，而是从事实际经济工作。但由于主要是在国家计委和国家体改委从事综合经济规划和综合改革规划方面的工作，政策性和理论性很强，随时都面临着种种重要社会经济问题，必须通过认真的调查、分析与研究，以探索如何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加上这两个机构，都是国家最高和最权威的综合经济管理机构，所接触拥有的经济资料和信息很丰富，也非常有利于经济研究工作的开展。因此逐渐养成了一种结合实际不断思考，既遵循基本理论原理，又重视在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习惯和工作作风，提出过不少有一定个人特点和社会价值的观点。其中，比较有代表性和影响比较大的，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在有关经济理论和经济改革目标模式的表述方面

——关于现阶段我国经济形态的定位。早在 1980 年和 1981 年上半年，我在河北大学任教期间所著的《国民经济计划概论》一书中，就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同时也存在着并必须大力发展的商品经济和商品交换。这主要是因为，在目前我国社会主义阶段，还存在着多种所有制形式，存在着企业与企业、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实行货币工资制。因此，只有采取商品经济形式，才能实行不同所有制之间的等价交换，才能使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的产品通过交换得到价值补偿，才能保证劳动者按劳动获得应有的物质利益。也只有利用商

品经济的形式，生产者（企业）和消费者才能顺利地获得他们所必需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社会主义生产才能得以正常进行。并且提出：我们的经济部门，不仅要按照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对国民经济进行有计划的管理，而且必须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广泛利用各种经济杠杆，如价格、利润、税收、工资、奖金、信贷、利率等，并通过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调节生产、流通、分配与消费。由此至今，我始终是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改革的坚定支持者和推动者。

——关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在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了我国是“有计划商品经济”。但由于人们对这句话的重点理解不一样：强调前半句，就要有计划；强调后半句，就离不开市场。因此，对于改革的具体出路和目标模式的设想也很不一致。对此，我结合国内外近二三十年的改革实践，将多种多样的意见，概括为可供我国改革选择的四种目标模式。即，将原来那种传统的集中计划经济模式改为：（1）改良型的集中计划管理模式。也就是，对各级政府的经济管理权限可适当调整，对企业可给予一定的刺激因素，但仍然以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手段调节为主；（2）改为指导性计划加间接行政协调的模式。即国家的指令性计划可以取消，全部改为指导性计划，但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协调，仍然不是通过市场，而是继续依靠国家各级行政部门的纵向集中央策来进行；（3）改为基本非控制的市场协调模式。即在宏观上基本没有国家计划，企业实行自治制度，经济活动几乎全部由不受控制的市场关系来协调；（4）改为宏观计划控制下的市场机制协调模式。即，宏观上由国家制定科学和符合实际的计划进行有效控制，微观上主要靠市场和市场机制来协调。亦既通过国家计划的全局性，来制约市场经济活动可能产生的盲目性；又运

用市场经济活动的客观性，来制约国家计划可能产生的主观性。并且积极提出建议，我国经济改革需要达到的目标，应当是第四种模式。有关这种模式的更形象表述，在80年代后期，曾经进一步概括为“三化”，即经济的运行机制市场化，企业产权股份化（或多元化）和宏观调控间接化。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异同。我在1992年曾经提出：二者既存在着很大的共性，也有一定的特性。关于二者的共性主要是，都必须坚持市场的基础性、竞争性、开放性和政府调控的间接性。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性是：从领导力量看，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从所有制结构看，是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从分配制度看，是以按劳分配为主的；从经济运行过程看，是有一定计划指导的。但在有关社会生产组织的下述三个阶段：宏观经济决策、企业生产经营和社会财富分配中，运用计划手段进行指导，主要只能针对前后两个阶段；对中间一个阶段，即企业的生产经营，必须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积极按照市场原则办事。并且特别强调，要真正实行并搞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键是必须弄清和遵守市场经济的上述共性，决不能首先强调社会主义的特性。因为，离开了上述共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无从谈起。

——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标志。1992年以后，我曾经将此问题概括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经济上，实行公有制（包括国家的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占主体地位上的市场经济；二是在政治上，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

（二）在有关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方面

——对1988年的高通货膨胀和全国性商品抢购成因的分析。一般都认为，主要是由于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和经济改革推进过快

造成的。我则始终认为,是三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对1985年和1986年经济过热的调整,1987年底还没有完全到位,1988年初又很快启动了;二是,价格攻关任务和价格改革目标(绝大多数产品完全放开由市场调节)公开宣布的时机选择不好;三是,在物价指数同银行存款利率出现了严重倒挂的情况下,因顾虑国有工商企业增加负担而迟迟没有提高利率。仅此,即直接影响6、7、8三个月储蓄存款增加额大幅减少,甚至纷纷提款抢购商品,致使1988年全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比原计划少增加了300多亿元,相应地增加了货币发行300多亿元。如果及时提高利率,增加货币回笼,就既不会出现全国的抢购现象,也不会采取急刹车的办法进行经济的治理整顿,导致经济随后差不多3年的低速增长和比较萧条。

——对1996年宏观经济调控力度的选择。在1995年底和1996年初许多同志都认为,由于1995年物价指数仍高达15%左右,说明经济的总供给仍然不足,1996年应继续采取宏观控制从紧,压缩通货膨胀,着手调整经济存量结构的政策。我认为,影响1996年经济健康发展的主要因素,已经不是通货膨胀,而是需求不足。因为1995年物价指数居高不下,主要是1994年高通胀的“翘尾巴”影响,1996年这个因素已不存在,通货膨胀率最终肯定可以降到计划的10%以内。而且认为,在最终需求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要想用增加流动资金贷款的办法来调整存量结构是根本做不到的。因为,国有企业不能优胜劣汰,产品有销路的增产了,没有销路的也不能停产,结果只能是大量增加库存积压,造成新的损失浪费。最好的办法是,合理调整宏观控制力度,并改变银行资金投向,适当增加投资,扩大最终需求。这样既防止经济增长速度过多下滑,又保证经济增长的质量。这种看法,实践证明是符合实际的。

——关于我国经济改革当前面临形势的估计。不少同志认为，主要难关已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成。我认为，20年改革虽然取得了巨大成绩，但至今还任重道远，并未完成。突出的是，在我们面前还有四大难关必须越过：即：（1）金融投资体制改革和要素市场的建立；（2）国有企业改革；（3）政府机构精简与职能转换；（4）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而且，在这四大难关之间，是密切联系相互制约的，要解决任何一个问题，都涉及其他问题的解决。如金融投资体制改革和要素市场建立难以较快推进，主要是因国有企业改革滞后难以适应；但国有企业改革长期到不了位，很明显主要又是政府机构精简、职能转换与分配、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严重滞后。必须下决心尽快突破这几大难关，使主要方面的体制基本协调配套，才能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

（三）在有关国有企业的改革方面

——关于国有企业弊病的根本成因。一般都认为，主要是微观管理搞得不好造成的，我认为根本的是在宏观管理上背离了马恩原来的思想。马恩之所以要在社会主义实行公有制，目的是为了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两大弊病：一是人剥削人的制度，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劳动者社会地位低下，积极性很差；二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导致私人资本家之间的盲目发展、盲目竞争，经济很不稳定。因此，曾经讲过可以实行的公有制形式有许多种，并没有说过主要就是搞国有制。把国有制当成公有制的主要形式甚至最高级的形式，是从苏联开始的，这本身就不完全符合马恩的原意。特别是从苏联起一直到现在，我们所实行的对国有企业的一整套管理办法，不但达不到马恩设想的目的，而且必然带来种种严重弊病。比如：（1）我们实行国有制，

从形式上看是消除了资产所有者对无产者的剥削，但由于在企业中实行的分配制度不合理，等于又形成了一种新的剥削制度——平均主义，即劳动少、贡献小的人剥削劳动多、贡献大的人，劳动者的积极性照样调动不起来。(2) 实行国有制，听起来似乎消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但由于将国有企业又分别划归各级政府部门与地方去领导和管理，实际上等于变成了部门、地方所有制，仍然无法消除上述矛盾。加上部门和地方都拥有种种行政权力，他们往往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来搞部门分割、地区封锁，其带来的盲目建设、盲目生产甚至比私有制条件下还严重。因此，我曾提出：我国的企业改革既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又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国有企业的传统模式。

——关于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具体含义：从80年代末我们第一次提出，国有企业要借鉴乡镇企业的机制，1991年又正式决定国有企业改革必须转换经营机制以来，到现在已经有10年了。但其具体的含义是什么，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表述和概括。经过多次调查、分析和比较，我在90年代初明确提出了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不合理，主要体现在政企、劳企、党企三大关系严重不顺。即，一是，政府与企业之间始终存在着上下级的直接行政隶属关系，企业很难成为一个真正自主的企业；二是，企业中劳动者长期捧着“铁饭碗”，吃“大锅饭”，实行平均主义分配，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很难调动起来；三是，企业中的党、政关系复杂，核心、中心的矛盾很多，优秀经营者的作用很难充分发挥。并且认为，这三大关系如果理不顺，国有企业的改革就不可能到位。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至今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的要害所在。一般的说法甚多，如历史包袱沉重、重复建设多、企业管理水平不高等。我认为，最要害的还是产权制度改革严重滞后，导

致政资不分、政企不分、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的积弊，至今没有大的改革。因此，国有企业改革要真正取得突破，必须从产权制度的改革开始，下决心在产权改革上动真格的。当然，这并非要搞产权私有化，而主要是应根据不同情况对企业产权进行合理调整与重组。比如，对公益性和垄断性的国有企业，一般应继续由国家所有，并实行严格的经营责任制度；对基础性和先导性的企业，应当改为混合所有制的企业，实行股权多样化，但国家一般可以继续控股，包括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对大量竞争性和盈利性的企业，可以改现在的国有独资为国家参股，但参与不参、参多参少，要以国家财政是否有资金去投入和是否有较好的投资回报为原则，有财政资金和较高投资回报的就多参，没有就不参或少参。既较好地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又有效促进政企分开和国有资本运作效益的提高。在近期内，由于种种原因，按上述原则进行产权重组调整还难以较快推进的情况下，可以借鉴 60 年代初经济调整时期的成功经验，对一些长期亏损、扭亏无望，又没有发展前途的企业，下决心关停并转，对职工按月发给一定生活费养起来。这样，不但可以大大减少国家资产和资源的损失；而且可以促使职工积极自找出路，尽快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也有利于在三年内实现绝大多数国有企业解困的目标。总之，反正是国家肯定要为此付出代价，根据过去经验，“养企业不如养人”的成本低，效果好。

（四）在有关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总结方面

为什么在大多数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多年改革成就不大，而中国的改革却取得了巨大成功？长期以来国内外都有许多评论，但至今并没有一个比较完整和比较准确的说法。我认为，除了有邓小平理论作指导以外，关键是较好地处理了五个方面的关

系：即：(1) 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关系；(2)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3) 市场发展与所有制结构调整的关系；(4) 激进改革与渐进改革的关系；(5) 借鉴外国经验与从本国国情出发的关系。其中，对以下两个关系作用的评价，同一般的看法明显不一样。

——关于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谁先谁后的问题。一般都认为，中国改革之所以取得了成功，主要是先搞了经济改革；而原来社会主义的苏联改革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先搞了政治改革。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很不确切的，也不利于正确经验的总结。因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也是在打倒了“四人帮”，全面总结批判了过去20年的严重错误，从政治思想与组织路线上进行了一系列拨乱反正以后开始的。这实际上就是一种重要的政治改革。如果没有这种政治改革，我们的方针就不可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的基本路线，就不可能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转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我们就不可能有“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改革总思路；就不可能在农村普遍实行以户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就不可能在经济建设中发展包括私人、外资和个体在内的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形式；就不可能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生产力标准理论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等。所不同的主要是在这方面的做法不同，我们是在坚持共产党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进行的，始终没有出现思想和组织的混乱；他们搞的是所谓公开性、民主化，不加分析地否定和全面批判过去的所谓错误，从而导致了党和政府的威信严重降低和无法控制的严重社会政治动荡，使经济改革也难以顺利推进。

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当前，我国一方面在加快经济改革

的步伐，一方面也正在抓紧酝酿和进行政府机构精简、职能转换、企业人事干部制度与理顺政企关系、劳企关系和党企关系等方面的改革；并且在保持社会稳定的条件下，积极加强民主法制建设。这也是一项非常繁重的政治改革任务。因为，如果只有经济改革，没有相应的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也将是很难进一步深入推进并取得最终成功的。

——关于激进改革与渐进改革孰优孰劣的问题。一般都认为，中国经济改革之所以取得了成功，是采取了渐进式的改革办法，原苏联和东欧有些国家的改革之所以不成功，主要是采取了激进式的改革办法。我认为这种评价也是不确切的。因为，在1991年以前，原苏联搞的所谓激进改革，基本都只是停留在口号和文件上，实际上根本没有真正这样做。1991年以后，虽然采用了这种办法，但又明显脱离了本国国情，即在没有真正的市场和国有制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就实行所谓的“休克疗法”，只能变成“休克不疗法”，不仅达不到应有的效果，而且必然造成严重混乱。这绝不能说是激进改革错了。因此，对这两种改革方法不宜绝对化，在二战以后，原西德和日本曾经采用过激进改革办法，应当说还是很成功的。

同时我们必须深刻地认识到，经济改革是一种经济体制和机制的根本变革，必须形成一种在各个领域相互协调、基本规范的体制和制度，才能充分发挥出新体制的应有优越性。否则，就不可能达到改革的目标。从而在指导思想上必须明确，改革也绝不能长期局限于一点一点前进的渐进式方法，在必要时应当下决心在一些重要环节上加快改革步伐及其相应的配套措施，使之较快地从量变转到质变，这无论如何也是不可避免的。不然，不但一整套新的规范的体制和机制将迟迟建立不起来，而且由于两种体制、两种机制长期并存，经济生活中的矛盾、漏洞、摩擦甚至冲

突必然很多,就会出现经济秩序混乱、以权谋私、行贿受贿、贪污腐败等问题。长此下去,势必会带来严重的社会政治后果。根据各方面的情况分析,我国的改革现在可以说已经面临这样的阶段,不加快改革也不行。因此,我们在肯定和宣传渐近式改革的经验时,决不能忽视这种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要求。

三、主要学术成果

1.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现在,自著和主编出版的著作有:《国民经济计划概论》、《企业改革的主要模式研究》、《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出路》、《中国市场经济大趋势》、《中国的道路——改革十六年的基本经验》、《现实的选择——中国中小企业改革实践的初步总结》、《中国经济的软着陆——我国宏观调控经验的初步总结》等书。

2. 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现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有关经济改革与发展方面的论文共200多篇,达200多万字。其中,主要的有: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理论依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研究;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问题;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浅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关于我国价格改革的思考;产权制度改革与流动重组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社会主义条件下股份制的性质和作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改革国有经济的传统模式;正确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切实推进所有制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关于正确发挥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问题;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搞好宏观经济调控;关于我国分配制度改革的探讨;关于搞好“两个转变”的思考;从东南亚金融危机看我国当前经济形势与主要对策;中国经济改革20年的成功经

验等。这些文章的主要特点是，重视从我国国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涉及面广，思想解放，观点一贯，既具有必要的说理性，又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其中有关对我国的宏观经济分析，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方面的基本思路与主要观点，在我国经济学界有一定的代表性。

四、关于这本《文集》

这本《文集》收集了我在1980年至2001年初的部分论文，共93篇104万字。《文集》分三卷。

第一卷：加强宏观经济管理；计划体制改革；经济形势分析与对策。

第二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论；经济改革理论与实务。

第三卷：企业改革；外国经济管理体制研究与借鉴。

作者

2001年5月

总 目 录

第一卷

自序

第一部分 加强宏观经济管理

第二部分 计划体制改革

第三部分 经济形势分析与对策

第二卷

第四部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论

第五部分 经济改革理论与实务

第三卷

第六部分 企业改革

第七部分 外国经济管理体制研究与借鉴